

■ 跨媒体研究丛书

主编：聂圣哲 蒋晓丽



涌现与互动

YONGXIAN YU HUDONG

—— 网络社会的传播视角

● 彭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四川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

■ 跨媒体研究丛书

主编：聂圣哲 蒋晓丽



涌现 与 互动

YONGXIAN YU HUDONG

—— 网络社会的传播视角

● 彭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涌现与互动：网络社会的传播视角 / 彭虹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7

(跨媒体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04 - 8989 - 4

I. ①涌… II. ①彭… III. ①计算机网络 - 传播学 - 研究
IV. ①G206. 2②TP3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2732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乔继堂 张 鹏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21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跨媒体研究丛书》总序

众所周知，以传播媒介的巨大变革为依据，人类传播历经了上古的口头传播、中古的手写传播、近代的印刷传播，直至现代的电子传播四个主要历史阶段，而四个历史阶段的不断更替、四种传播媒介的依次更新，一定程度上是人类传播渴望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满足人们多元信息需求的体现。

尽管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人类传播经历了以上四个阶段，但是作为每一阶段主角的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四种传播媒介的关系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并不是前后相继而是前后相叠的。一方面，它们各行其是、特立独行；另一方面，它们又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共同成就了人类传播。在这其中，以文字的逻辑、深刻为特色的报刊杂志，以声音的平易浅显为风格的广播，以兼具声画优势的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与以海量、及时和互动为特点的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一起，组成了大众传播大家庭。

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数字化、计算机网络和虚拟现实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这些技术在传播、通信等领域的全方位渗透与应用，传播媒介经历着巨大变革，传统媒介正在冲破自身局限，原本泾渭分明的几种媒介之间的界限开始打破并悄然兴起一场新的融合，人类传播已进入媒介融合时代，也被称为“跨媒体时代”或“全媒体时代”。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概念最早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和他于 1983 年在其《自由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中提出的“传播形态融合”（the convergence of modes）。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一体化多功能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讲，媒介融合是不同技术的结合，是两种或更多技术融合后形成的某种传播技术，由融合产生的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介的功能大于原先各部分的总和。作为一种媒体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媒介融合是国际化、全球化浪潮下传媒求得生存的新产物，是历来泾渭分明的几种不同传播技术为了实现传播一体化、多功能的新手段，是促成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和移动

手机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以实现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进而达成节约生产成本、实现规模效应目标的新模式。

按照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李奇·高登（Rich Gordon）于2003年针对美国当时的媒介融合状况作出的归纳，媒介融合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融合：所有权融合（ownership convergence）、策略性融合（tactical convergence）、结构性融合（structural convergence）、信息采集融合（information-gathering convergence）和新闻表达融合（storytelling or presentation convergence）^①。同时，在到达媒介完全融合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最初是依靠行政力量的组织的融合，然后是在市场作用下以集团兼并为代表的资本融合，进而再到传播手段的融合，这是一种大型传媒集团的不同媒介的传播手段在同一大平台上进行整合，实施这些媒介之间的内容相互推销和资源共享的融合，最后才是媒介融合的最高阶段，媒介形态的融合，即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推动下产生的新媒介类型——融合媒介，这种媒介融合了几种甚至全部媒体的优点。

我们常说的“跨媒体”和“全媒体”，可被视为“媒介融合”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其中，“跨媒体”之“跨”，凸显了跨媒体更多体现为一种媒介融合行为，而“全媒体”之“全”，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媒体更多作为一种媒介融合状态。

所谓“跨媒体”，是指横跨平面媒体（报纸、杂志、图书、户外广告）、立体媒体（广播、电视、电影）和网络媒体的三维平台组合，其核心在于不同媒体形式之间的“横跨”组合，它强调媒体外在形式之间的一种组合，或许通过行政力量使然，或者通过市场作用使然，处于媒介融合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而“全媒体”是指综合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如文、图、声、光、电来全方位、立体的展示传播内容，同时通过文字、声像、网络、通信等传播手段来传输的一种新的传输形态。作为一种媒介融合状态，它继“跨媒体”、“多媒体”之后逐步衍生而成，是媒介融合的高级阶段，是人类现在掌握的信息流手段的最大化集成者，体现的不是“跨媒体”的简单连接，而是全方位融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乃至通信的全面互动、网络媒体之间的全面互补、网络媒体自身的全面互溶。

可以看出，三个概念中，“媒介融合”的含义最为广泛，包含的内容最

^① 蔡雯：《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载《中国记者》2007年第1期。

多，“全媒体”所描述的是媒介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高级阶段，它侧重于不同媒体在共用一套机构与人员的情况下进行传播手段融合、内容互销和资源共享。然而，我们国家当前的传媒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基本经历了行政力量促进融合，逐步在由市场作用促进融合走向传播手段的融合，所以，三个概念中，用“跨媒体”来描述我们的传媒实际，是更为贴切和妥当的，这也是本丛书采用“跨媒体研究丛书”的根本缘由。

无论是作为发展趋势的“媒介融合”，还是作为生存状态的“跨媒体”，还是作为阶段目标的“全媒体”，它们都揭示了当下传媒发展和新闻传播的时代语境。清楚地认识当下传媒语境及其特点，无疑对传媒经营管理、新闻采写编排等传媒实践有着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意义，对传媒人提高自身职业素养而言，也是异常关键的。因此，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媒文化与传播实践，为我们的跨媒体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契机，这不仅鼓励我们努力探索研究，更成为我们萌生出版此丛书念头的最原始动力。

典盛传播、环球活动网总裁欧阳国忠2007年8月在接受《北方传媒研究》编辑部采访在谈及新媒体时代特点时，进行了如下概述：新媒体时代传媒，主要会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内容生成的“即时性”——越来越多的内容生成和传播的过程正在重合起来、内容获取的“即地性”——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手段获取即时的信息、内容传播的“互动性”——内容的接收方对接收的内容有更多的选择权、广告投放的“定向性”——广告商可以更有效地针对个人目标客户投放广告^①。可以说，这既是媒介融合时代的传播特点，更是跨媒体时代的传媒目标。如何能实现传媒自身、受众、广告商三方面的共赢，不仅是传媒业界人士需要考虑的，更是传媒学术界人士需要努力探索研究的命题。

作为四川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项目的成果，“跨媒体研究丛书”所涵盖的研究范围主要包含有：

(1) “跨媒体”或“媒介融合”对象研究和过程研究。如对媒介融合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资本融合与结构融合、技术融合与生产融合以及融合过程中所遭遇的政策规制和行业壁垒等问题的研究。

(2) “跨媒体”或“媒介融合”对各项传媒实践的影响研究和各项传

^① 2007年8月，典盛传播、环球活动网总裁欧阳国忠接受《北方传媒研究》编辑部的电子邮件采访，文字整理为《新媒体环境下的电视产业运营》一文，刊发于《北方传媒研究》2007年第4期。

媒实践相应的对策研究。如对跨媒体环境下的新闻采编研究，如对报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等等。

(3) “跨媒体”或“媒介融合”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研究，体现为媒介融合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如在跨媒体传播格局中的政府信息传播研究、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传媒文化研究和受众心理研究等等。

无论是哪一类型的研究，本丛书都强调对传媒现实当下的针对性，对传媒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性，和对传媒未来发展的指导性和预测性。

本期拟出版的八本专著，包括蒋晓丽等的《奇观与全景——传媒文化新论》、石磊的《分散与融合——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王积龙的《抗争与绿化——环境新闻学在西方的起源、理论与实践》、刘肖的《理智与偏见——当代西方涉华国际舆论研究》、侯宏虹的《颠覆与重建——博客主流化研究》、张放的《虚幻与真实——网络人际传播中的印象形成研究》、张杰的《变革与回归——中国政府网络信息传播研究》和彭虹的《涌现与互动——网络社会的传播视角》。每一本书都是作者对跨媒体、对媒介融合所作出的探索和研究，都凝结了作者的努力和心血，为理性建构媒介现实，深入认识媒介未来，不遗余力地思考和探索。

在这套丛书出版之际，衷心感谢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对我们的研究始终如一的关注和支持；衷心感谢德胜（苏州）洋楼有限公司一直以来的鼎力资助；也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任明老师以及所有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朋友和同事们。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仅凭以上的几本书，难以支撑起整个“跨媒体研究”的框架，但是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在传媒学界和业界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愿意在未来的传媒研究进程中继续将之充实和延展，为有效地认识和指导传媒实践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是为序。

聂圣哲 蒋晓丽

2010年春

目 录

序言	(1)
一 人文也是科学	(2)
二 整体的观念与方法	(7)
三 研究对象与论述体系	(12)
第一章 网络传播：纠葛中的回顾与审视	(16)
第一节 网络：一个时代的到来	(16)
第二节 传播语境中的网络与网络环境下的传播	(30)
第二章 网络传播：概念、系统与演化	(44)
第一节 需要界定的几个概念	(44)
第二节 互联网：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	(53)
第三节 网络传播：系统与演化	(65)
第三章 涌现——网络传播的表象	(77)
第一节 网络传播中的涌现	(77)
第二节 历时与当下的信息涌现样本	(86)
第三节 规则与秩序的涌现	(98)
第四节 知识传播中的涌现	(107)
第五节 思之涌现	(118)
第四章 互动——涌现的内在逻辑与动力	(132)
第一节 互动：概念与形态	(132)
第二节 互动：社会关系的重构	(141)
第三节 互动：符号与意义的交睫	(151)
第四节 互动：信息权利的博弈	(163)
第五节 互动：理性与非理性的螺旋跃迁	(171)
第五章 行进中的虚拟实在	(181)
参考文献	(189)
后记	(191)

序 言

阳光、空气、水，Internet^①……

网络，已经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工具、伙伴、生存的要害。网络是传播的一个部分，抑或，传播是网络的一种功能，这其中的交织与含混，自Internet诞生以来日渐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今天，网络传播的研究已成为“炽热”的论域，然而，网络传播研究边界、范式的确立尚处于探索的时期。

事实上，传播、网络传播研究，以及人类所有的研究，一直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宏大框架下延续、进行。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人文学的历史远远长于科学，而科学脱离纯正的人文学传统学科——哲学迅猛发展，社会科学独立成长，以及人文科学的式微，不过400年的历史，其间的波澜壮阔，各体系之间的自大狂妄与矫枉过正，无不折射出形成今日的学术研究分类框架以及学术取向的曲折和艰难。我们去探究那些关于观念的对峙，那些关于方法的诘难，那些关于评判标准的水火不容，只是为了划定研究题域的边界，建立有效的研究范式，以便将网络传播的研究进行下去。

^① 中国自Internet兴起以来，对于Internet主要有两种称呼：“互联网”与“因特网”，其他还有“国际互联网”、“因特网”、“国际计算机互联网”等。实际上Internet进入中国之后，率先出现的中文译名是“互联网”，随后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97年7月18日在《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第二版）与《网络与数据通信名词》（第二版）中，将“因特网”作为“Internet”的汉语推荐使用规范名词；而将“互联网”作为“Internet”的汉语推荐使用规范名词。《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对“互联网”所下的定义是“由若干电子计算机网络相互连接而成的网络”；而对“因特网”所下的定义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子计算机互联网，是由美国的ARPA发展演变而来的”。实际上，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互联网”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因特网”。对应于网络媒介或者网络传播而言，“网络”一般可指“Internet”，因此在言说“Internet”时，大多应该使用“因特网”，但仔细查阅传播类学术文献时却发现大量使用的是“互联网”，甚至在同一篇文献中混用“互联网”与“因特网”。为了讨论的准确，本文原则上用“互联网”（包括引文），在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直接用“Internet”。

一 人文也是科学

“人文”一词更多源自出现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 humanism (德文 humanismus) 传统。“humanism”一词包含三层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①;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和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②。欧洲自14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以来,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成果:第一,建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humanities);第二,倡扬了一个崭新的信念体系,即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和最高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汉语的“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同样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以及诗、书、礼、乐等文化形式。西方之“人文”与中国之“人文”滋生于不同的土壤,流变于不同的路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作为“人文”的第一要义的理念一直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方面。

英文中的 science 一词基本等同于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 science 来自拉丁文 scientia, 而后者含义更宽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 wissenschaft (科学)与拉丁文的 scientia 类似,含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比如黑格尔的哲学科学、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李凯尔特的人文科学等。这些语词的历史演变关联并暗示了一个更为深广的,由希腊人所开创的思想传统——“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这个思想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

① 人文主义(源于拉丁语 humanus,指“以人为中心的”),是从14世纪开始于欧洲的一场理智运动,并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顶点。人文主义者通过强调人的理智与文化成就而不是诸如神的干预、生命的短促悲惨以及逃避的需要,来反击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其次,欧洲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伟大人文主义时期,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促成这场运动的思想,还是旨在摆脱宗教的桎梏并尊重理智的活动,不用上帝怜悯的保证而用知识照耀人的生活。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19、20世纪的科学理性主义的时代。达尔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量子力学等等,仅仅是这条连续前进道路上的几座高峰。“人文主义”一词,首先开始指一种公开反宗教的态度,即人不只是“万物的尺度”,而且是唯一的尺度。今天,世俗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及人权。

[英]肯尼迪·麦克利什主编:《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中),查常平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91页。

②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2页。

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

在从前，哲学不仅是与科学的关系最近，实际上，哲学就是科学。在柏拉图那里，philosophos 爱的、追求的是 episteme。Episteme 这个词现在经常就被译成科学，在英文里则经常译作 science。柏拉图通过 episteme 这个词把哲学家和诗人或神话家区分开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的目标是到达 episteme。Philosophia 与 episteme 常替换使用，例如他也把理论科学称为理论哲学。^①

希腊哲学 (philosophia)，就是摆脱实际需要与功利的束缚，探求那种“超越”的知识，建立一种与世界的“自由”关系，而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爱智慧、学习知识。从柏拉图、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形而上学）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近代科学之前的希腊哲学正是体现出强烈科学传统意味的经典样本，其中之一的“自然哲学”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亲”，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孕育下才可能发展壮大。

中世纪希腊的经院哲学特别弘扬理性精神，原始的基督教因信称义，重信仰轻知识。12 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基督教神学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这种经院哲学应该称为科学形态的神学才更为恰当，因为它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而不是单纯强调信仰。经院哲学的逻辑理性思想深植于欧洲人的心中，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这种思想仍然流传下来。“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②

希腊科学在向近代科学演变的途中分别滋长了两种传统，即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这两种传统的典范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16、17 世纪，近代科学肇始于自然的数学化运动，即把自然科学之对象——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伴随这场运动，培

① 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 页。

② [英]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3 页。

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等方法论被科学家群体迅速接纳。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研究机构、科学社团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进路。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由默顿提出）——普遍性、公有性、公正性、怀疑性。

近代科学不仅传承与光大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而且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奠定了现代工业社会。“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①近代科学以“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的全新姿态傲视人类，理性传统逐渐让位于技术理性，屈从于“权力意志”的“力量”，裹挟于对理性传统的无限扩张。技术理性是由传统理性衍生出的典型形态，是一种人类的智慧行为，是一种扎根于人类对物质需求及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以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为基本目标。其基本特点是科学的合理性，社会的合意性，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和技术规范的有效性，物质需求功能化，效用最大化，设计的理想性、创造性、妥协性，制造和生产的条件性、强制性。技术理性使人们确信，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②

古典科学以辉煌的态势向近代科学挺进，同时，科学的观念、理论话语与研究范式也开始向社会以及人文等领域长驱直入，进而，科学的认识过程与认识方法，亦开始影响人类的思想。科学，既是一个知识系统，也是一个方法系统，更是一种认识工具。社会领域的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率先借助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与工具发展起来，在短短几百年间取得了不逊于近代自然科学在各个学科所取得的成就，成为社会科学的典范学科。在社会科学这些典范学科的映衬下，具有悠久学术传统的人文领

① [美] 科恩：《牛顿革命》，颜锋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② 前述关于古希腊科学向近代科学演变的相关内容，参见吴国盛《科学与人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7期。

域的哲学（曾经包含了科学传统）、语言学、诗学、政治学、逻辑学、修辞学、神学等学科的科学化已渐成趋势。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或者说在一个科学主义泛滥的时代，人文学不得不捍卫其学术的传统与纯正，甚至坚持称其为“人文学科”^①。至此，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架构得以确立。科学在演进的过程中逐渐脱离了先前的本义——“知识”，而人们又完全接受了今日狭义的科学之意，于是困惑与冲突便油然而生。进入20世纪，中国的“科玄之争”，斯诺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索卡尔的“诈文”^②等一系列事件，都在印证这种对峙的激烈。

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潮流亦从西方蔓延至东方。

实际上，一直到1900年之前，中国并无“科学”这一词，是用“格致”指称西方自然科学；“科学”这个词是日本学者西周于1874年最早运用，它被用来说明分科之学。1900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才放弃“格致”，而用“科学”来指称自然知识的探索。^③

① 近世西方人文科学学者迟迟未能就学科的总体名称达成一致的共识，而得先后尝试自不同的切入点缔造不同的术语去和“自然科学”这基本上一致的术语对应这一种境况，充分反映了西方人文科学在自然科学笼罩下寻求自我定位的路途是如何崎岖。除了统一“人文”之称谓外，还必须强调其为“科学”！论者或会问：能不能把“人文科学”改译成为“人文学”，或者如一些颇通行的办法，译之为“人文学科”呢？就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或起码是不应该鼓励的。“人文科学”却非一个别学问，而是一组以人类心智活动为对象的学问的统称，而最重要的，“人文科学”是与“自然科学”相对而立的，因二者同样都是统称的（例如，从来没有人特别把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相对而论）。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之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8、15页。

② 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5位主编都未能发现这些错误，也没有识别出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经主编们一致通过后文章被发表。随后，他的另一篇文章便在《大众语言》上发表，题目是：《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事件一俟发生，立即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由科学家、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另一方则是后现代思想家结成的联盟。世界诸多著名的大师名家，众多的知名媒体均参与其中，引起了知识界的一场轰动。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参见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953502.htm>

③ 金观涛、刘青峰：《新文化运动与常识理性的变迁》，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第52期。

中国的启蒙运动家在 20 世纪初对引进西方学术思想作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可惜的是，他们在救亡的危机之中，呐喊有余，分析不足。只注重引进结论，不注重研究方法，在若干基本问题上，犯了用传统观念曲解科学思想的概念性错误。严复介绍达尔文理论，不译达尔文原作，而译赫胥黎的伦理学小册子，不仅开中国把科学理论加以意识形态化的先河，而且将“演化论”^①误译为“进化论”。梁启超进一步将生物学多样化的演化曲解为“优胜劣汰”的单向进化。他们对达尔文理论的片面宣传造成的广泛误解至今仍存在。^②

中国学界对于达尔文“演化论”的臆译，马克思分配原则的误译，凯恩斯名著标题的俗译等，许多观念、方法、理论在传入中国以后都因种种原因而面目全非，这些改变如果仅仅用比较文学或者翻译的信、达、雅来解释，是很难被采信。那些深藏其间思想，在中国这个拥有独特文化传统“语境”的国度中被逐渐肢解和缓慢误导，而每一个被肢解和误导的细微之处，无不反映出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冲突，西方近代科学与西方传统人文的冲突，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文化的冲突。

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以及与之关联的一系列技术和社会系统，在现代化的语境下这是中国知识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一般而言，中国既没有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哲学传统，亦没有产生西方近代科学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基础等，是知识界讨论上述问题的主要论据。对于此，我

^① 英文 evolution 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 *evolutio*，意思是展开，指任何事物的生长、变化或发展。包括恒星的演变、化学的演变、文化的演变或者观念的演变等。生物进化常常被定义为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然而生物演化本身并无任何目的和方向，因此演化是比进化更为恰当的翻译名称。查尔斯·达尔文在其名著《物种起源》有详细的论述，并首先提出天择观念作为演化的机制。演化论认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是来自 30 多亿年前形成的共同祖先，之后生物持续不断地演化，直到今天，世界上存在着大约 170 多万物种。参见百度百科：演化，<http://baike.baidu.com/view/712348.html>。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用的是“演化”来表达达尔文“evolution”的概念，为了防止误解，他曾特意在注解里注明，这个词不仅有“进化”，也有“退化”的意思。后来，北京大学教授马军武翻译《物种起源》时，从日文版翻译成了“进化”，并从此沿袭到今天。学术界曾经对此有过讨论，很多人试图扭转这个翻译，但在公众中，这个误读并没有改变。参见张伟、刘旸《进化论在中国备受推崇的背后》，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2009 年 2 月 25 日，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2/25/content_2554431.htm。

本书在需要使用“演化”之处则恢复其本意。

^② 陈平：《文明分叉、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76 页。

们有太多的耿耿于怀和怅惘失落。我们经常在希腊哲学的爱（philo）智慧（sophia）之处，将中国传统的智慧等同于“哲学”，把易经、阴阳五行等学说视作经典，坚持大而化之、因大不经的学术追求。对于希腊哲学中延续悠久的科学“基因”无心去深究，对于希腊用理性的态度与方式去构建理论的“历史”亦视而不见。一直以来，在西方人文中所蕴涵的希腊科学精髓，以及在中国科学中所延续的人文文脉，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的科学中尚且延续了人文文脉，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无法脱离纯正人文传统的浸染，其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话语，亦不得不烙上“四书五经”的印记。

纵览人类文明的演化历程，希腊哲学传统下的自然哲学，以及以此为母体产生的近代科学，纯属一个偶然，一次无序状态下的演化，一个偶然又成为下一个偶然的发源，一系列偶然成就了今天的必然，犹如浩瀚的银河中地球诞生了生命，生物演化后产生了各物种的差异，或者同一物种中不同分支之间产生的异同一样。希腊以外的中国、埃及、印度等绝大多数民族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这，已经成为不可重演的历史，但文明的多样性，使得这些民族的文明的存在成为合理与必然，这些民族的文明在与希腊文明相互映衬中展现出各自的价值，并因此而熠熠生辉。真正的困惑在于，各个民族在轴心时代的历史语境下，背负着的那些强盛与荣光的观念和思想传统，是否能参与并顺应延续至今的这一宏大而不可逆转的文明演化。选择参与及顺应，就是选择新的可能，就是演化新的文明，就是迸发新的辉煌。人文与科学的同源、分离以及后来的综合，已成为演化的历程。整体还是还原，演化还是机械，这些观念、方法或者理论伴随这种演化的过程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二 整体的观念与方法

理论，是普遍的东西，与具体情况相对应，理论必须把对世界进行整体解释当作“己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都希望对世界给予整体的解释。但是，各个体系的整体观念与方法事实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像其他形态的理论一样，哲学有其神话渊源。神话和哲学都尝试为世界提供整体的解释。在神话的宏大叙事中，世界的起源和生活的规范是联系在一起的。哲学作为整体解释，也是这样，既重宇宙论也重道德论。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神话通过传说和想象来编织这种解释，而哲

学则通过经验一事实来编织这种解释。^①

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在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长期以来，西方科学被一种机械论统治着，按照这种观点，世界就像一台庞大的自动机。^②

以牛顿为代表的西方经典科学奠基者们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与永恒性，他们要努力表达的是符合真正理性理想的普遍图式。“他们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普适的统一框架，在这些框架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表明是系统地，即逻辑地或因果地相互连接着的。他们寻求广泛的结构，这些结构中不应为‘自然发生’或‘自动发展’留下空隙，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应至少在原则上完全可以用不变的普遍定律来解释。”^③ 这些不变的普遍定律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即相信在某个层次上世界是简单的，且被一些时间可逆的基本定律所控制。经典科学成功地开创了与自然的对话，只是这场对话的对象是一个沉默的世界。在对话的过程中，人，从自然中被孤立出来，与自然对立，人类理性的胜利被转换为一个令人失望的真理，那些真正的成就因夸大和扩张而被贬低了。李约翰曾强调，西方思想，就是在“自动机的世界”与“上帝统治着宇宙的神学世界”之间摆动的“思想”。伊·普里戈金这样总结经典科学的前世今生：

经典科学是在人和上帝的同盟所统治的文化中诞生的，人居于神明的秩序和自然的秩序之间，而上帝是理性的和可理解的立法者，是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想象出来的最高建筑师。经典科学经历了这个文化和谐的一瞬间而存在下来。这个和谐曾使哲学家和神学家有资格去从事科学活动，使科学家有资格去解释和表达有关神明在创世工作中的智慧和能力的观点。得到宗教和哲学的支持，科学家们相信他们的事业是自给自足的，就是说它用尽了合理研究自然现象的一切可能性。科学描述与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并非必须证明是正当的。不言而喻，科学和哲学是汇合在一起的，科学发现了权威性的自然哲学的原理。但奇怪

① 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② [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③ 同上书，第6页。

的是，科学家所经验的自足性，其寿命比中世纪上帝的离去和神学提供的认识论保证的撤退还要长久。^①

经典科学已如明日黄花，辉煌不再，形成这种格局的不是来自形而上学的批判与诘难，而是源自科学内部的发展。400年间，科学以迅猛的态势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的视野已经到达异想天开的境地，在微观范围，基本粒子物理学所研究的对象已精微到 10^{-15} 厘米和 10^{-22} 秒数量级的物理尺度，而在宇观范围内，天体物理学、宇宙学所涉及的对象已扩增到 10^{10} 光年的数量级，即所谓的“宇宙年龄”。19世纪，尤其是热力学、生物学、地质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都把研究的眼光投向了演化的过程，即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20世纪，物理学经历了两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转折，即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广义相对论，和以海森堡、薛定谔等为代表的量子力学，其实质就是在宏观与微观方面为经典科学中的经典物理学（力学）进行某种“校正”，使其能够适应对宇宙天体以及基本粒子的描述。经典科学一直以时间的可逆性与决定论的观念统治着科学，并以此为核心用强硬的姿态向科学以外的领域扩展。近代科学，以量子物理学、相对论、复杂系统的演化等研究为起点，以发现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随机性所支配的自然、社会的那部分奥秘为使命，并以此挑战经典科学观念的统治。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引领下，伴随生物科学与技术的长足进步，近代科学在观念与方法的广大范围内对经典科学发起了全面的变革。世界具有复杂的特点，结构可能消失，也可能出现，有的过程可以用决定论的方式去加以描述，而有的过程则必须采用随机或统计的方式去应对。整个科学研究与理论正在发生以下变化：

从孤立地研究对象转向在相互联系中研究，从用静止的观点观察事物（存在的科学）转向用动态的观点观察事物（演化的科学），从强调分析的、还原的方法处理问题转向强调整体地处理问题，从研究外力作用下的运动转向研究事物由内在非线性作用导致的自组织运动，从实体中心论转向关系中心论，从排除目的性、秩序性、组织性、能动性等概念转向重新接纳这些概念，从偏爱平衡态、可逆过程和线性特性转向重

^① [比] 伊·普里戈金、[法] 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